

【历史研究】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 理论背景和价值取向

胡正强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的空前发展和诸多缺陷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媒介批评的现实背景和内在根据。毛泽东新闻理论是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媒介批评的理论根据和政治标准。对资产阶级无冕之王、同人办报思想等新闻观点进行思想清算和理论批判,从政治路线和党的政策执行角度对媒体的传播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和评判,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重要价值取向。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媒介批评; 背景; 取向

[中图分类号] G 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1)01-0058-07

Views on the Media Criticism's Theory Background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HU Zheng-qiang

(School of Art, Design and Media,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and many defects of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journalism are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and inner basis to against media criticism to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War. Mao Zedong's information theor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olitical standards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war to carry out of media criticism. To clear and theoretically criticize the opinion such as uncrowned king of the bourgeois, and colleagues' newspaper, from the party's political line and policy enforcement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media, it is the importance of media criticism value orientation to th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War.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dia Criterion; Background; Orientation

自觉而理性的媒介批评始终是人类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建构性力量。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

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并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新的环境下,为了实现战争胜利的最终目标,新闻事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反映和引

[收稿日期] 2010-12-10

[基金项目]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项目编号:10JJDJNJD160)项目《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历史流变与优良传统研究》和南京理工大学 2010 年度自主科研专项计划资助项目《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史》(项目编号:2010GJY030)的研究内容之一。

[作者简介] 胡正强(1965-),男,江苏南京人,教授,新闻学博士。

导舆论、宣传和组织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的战斗的号角、有力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媒介批评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批评既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又为其发展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战争与新闻传播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关系,“战争不仅创造了新闻的供给,而且创造了它的需求。”^[1]媒介批评源于对新闻传播的定位设计和能动反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实践无疑是这一时期党所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一部分,服从和服务于党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十分重视新闻传播工作。“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最重要的条件是要能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下,形成伟大的斗争的力量。”^{[2][4]}抗日战争以前,党虽然拥有了自己的新闻事业,但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秘密状态,加之长期辗转迁徙和流动作战,党无法拥有全国性、公开性的新闻媒体,党的新闻事业的规模和影响都有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获得合法性存在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必须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一致。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方法多种多样,“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3]报刊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最有力工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同步,这些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由于有了较充分的新闻自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缺陷,正如《中宣部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华北,报纸、杂志在种类上和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大都起了一定范围中和一定程度上的作用。但大多数报纸杂志,显示出分工不明,彼此重复,数量多而质量差,形式铺张而内容贫乏的严重弱点。编辑、出版、发行的制度也尚不完善。”^{[2][114]}亟需予以纠正和改进,以充分发挥报刊的功能。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媒介批评的现实背景和内在根据。

媒介批评总是一种对象明确的主体性行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批评主体主要是各级党政、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如毛泽东、博古、陆定一、陶铸、彭雪枫、邓拓等人,都曾躬身媒介批评实践。尤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直接领导部门,更是经常在书信、电报、通知、决定、指示等形式中,进行相关的媒介批评,中宣部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媒介批评的重要主体之一。政治身份使他们的媒介批评在效力上更多地具有一种上级指示的品质,他们对媒介所作出的批评往往能够很快地在有关系统内传播并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媒介批评预期效果的有效实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客体如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样,也主要是党直接控制和领导下的各类报刊。由于这些报刊属于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这种媒介批评更多地具有某种工作回顾、总结、检讨的性质,一般不指向具体的文本和个人,而且往往在报刊出版的一些具有纪念性的时间点上,如发刊一百期、二百期等特殊的日子发表,批评口气温和,批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促进工作,与一般意义上的谴责性、论辩性媒介批评不同,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

批评主体总是以一定的标准作为根据和出发点,然后才能对批评客体作出衡量、评判和分析。虽然每一个批评主体各有不同的媒介理想,其所秉持的批评标准也都有各自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但并非每一种批评标准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没有轩輊之分,因为批评标准直接涉及批评的目的性和原则性,规定着媒介批评的展开方向。批评标准表面上是批评主体的主观产物,但其实具有客观的内容,受到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的制约,以政党为主体的媒介批评更是包涵和体现着政党的政治任务与使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具有高度的政治指向的一致性,即以党的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作为批评的主要标准。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936年初,中共中央就在为转变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明确提出“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2][82]}的工作思路,集中体现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媒介批评的主要标准,要求“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合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2][83]}虽然在不同的批评文本中批评的对象和问题各不相同,但其政治旨归则高度同一,即批评或纠正新闻传播中“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2][121]},以切实维护党的利

益,推动各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成熟阶段。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对新闻传播有许多相关的讲话、指示、电文、论文以及新闻作品,长期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媒介批评的理论根据和政治标准。如总政宣传部在《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中,批评“军事宣传的未被重视,军事宣传的成果不佳,不仅表现在量的少,而且表现在质的低”^{[2]161},就直接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的相关论述作为根据:“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说:‘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晰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事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在这里已经明白指出了‘宣传什么、斗争什么’的宣传政策。根据这个宣传政策来检查我们的军事宣传,过去做了些什么呢?”^{[2]162}1942年春天,毛泽东同志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4]。《解放日报》1942年的改版,其实就是该报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的具体行动。该报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自我批评的文章,而且在《信箱》专栏经常刊载读者对该报的意见,并配发编者按予以鼓励。1942年2月8日,《信箱》专栏刊登了《一个机关职员对于本报的意见》,并在编者按语中要求各方同志经常对该报提出批评和建议。在编辑部的支持和鼓励下,读者阅读该报时更加留心,积极主动地向他们提出报纸改进的意见。读者的参与扩大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主体范围,其中的部分内容因为来自读者的需要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也成为《解放日报》改版的努力方向。

在《解放日报》的带动下,各个根据地新闻媒体的有关人员先后认真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并据此对照检查新闻传播工作,进行深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高潮。华北《新华日报》社、晋东

南新华社社、《关中报》、《抗战日报》《新华日报》纷纷检查各自新闻编写工作,举行党八股检查大会。如新四军四师《拂晓报》社在接获中宣部有关整风的通知后,前后三次回顾与检讨了几年的工作,在报纸上公开地揭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监督和帮助。那时正值《拂晓报》300期,在三张十二版的纪念专号上,刊载了新四军四师政治部吴芝圃主任的文章《祝望于今后的拂晓》。文章在充分肯定《拂晓报》三年来工作成就的基础上,坦率地检查《拂晓报》存在的缺点。认为该报存在如下缺点:根据地方、部队的实际,生动具体地宣传党的方针显得无力;不能围绕中心工作从各方面深入宣传,给人脱离实际的感觉;刊登中外通讯社的消息多,缺乏阶级性,现实性;文字不朴素,玩弄光景,流连风月的描写多于对现实斗争的报道;运用报纸组织广大读者不够。该报同期上还发表了师政治部宣传部长陈其五同志《改进党报与爱护党报》的文章。他作为《拂晓报》的领导人,在感谢广大读者关心和爱护党报以后,也检查了该报的不足之处:报纸不够朴素,醉心于全国范围,矜持于大报风范,夸夸其谈,脱离具体实际;大文章多,装腔作势的滥调,相习成风,成为时尚,一提起大众化,就以为是降低身价,玷辱文坛;“工作中倾其全力提高技术(这是应该的),而对内容的改进注意得不够”。^{[5]60}陈其五同志还分析了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是报社的同志缺乏实际工作修养,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当时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单位,都像《拂晓报》这样在报纸上公开地、毫不掩饰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批评新闻传播的内容、形式,还反思新闻工作者的精神思想、工作作风,从人的灵魂深处和世界观方面寻找终极性原因。

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闻观念决定着报刊实践的面貌和方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和批判。破立结合,有破有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媒介批评起到了清道夫的重大作用。抗日战争开始后,党的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很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工作,其中不少人来自城市,“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学理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

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6]187}不在观念上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进行清算和批判,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势必就无法确立。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体系形成并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该文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系统地回答了新闻的本源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新闻的真实性等新闻学基本理论问题,该文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观点,建国以后作为大学新闻专业教材中对新闻的权威性定义一直沿用至今,影响广远。陆定一这个著名的新闻定义的提出,其实是建立在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新闻定义的基础上的。新闻学理论中的唯心论也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的“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他们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的本身,认为脱离了某种“性质”就不成其为新闻。这种“性质说”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不论从哪一条新闻来看,都会是合于或似乎合于某一种“性质”的,例如有些新闻就有“一般性”,有些就有“趣味性”等等。而且主张新闻应具有某种“性质”的人,也总能讲出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故而,许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就会被它迷惑。陆定一一针见血地指出: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趣味,因而这个新闻对于剥削者也就成为无兴趣的新闻。例如关于劳动英雄的新闻,就是如此。事实完整了,写出来就成为完整的新闻,事实尚未完整,报道这个事实的新闻也只能不完整。事实很“文艺性”,报道也自然会有“文艺性”,否则就相反,例如宣布政府或党的公告的新闻,有什么文艺性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都说明: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有什么决定作用。

陆定一认为“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東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业还起了

消极作用,因为如果相信了这种‘性质说’,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就一世也不会有结果,必致流入脱离事实,向壁虚造,无病呻吟,夸夸其谈。”^{[6]190}陆定一还继续剖析了“性质说”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法实质和危害,该种说法认为“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6]190}。确乎,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蒂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所以说“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那么,颠倒过来有什么害处呢?“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既然‘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末,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德意日法西斯‘新闻事业’专靠造谣吹牛吃饭,不靠报道事实吃饭,岂不也就振振有辞,有存在的资格了么?”^{[6]191}使用归谬法进行分析和驳斥,如此批判具有振聋发聩的强大逻辑力量。

对“无冕之王”思想的批判,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思想领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又一重要内容。“无冕之王”一语源出于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三大主笔时期。当时,被称为“大力神”的《泰晤士报》成为英国舆论领袖,主笔辞职后,常为内阁吸收为阁员,地位很高,人们称他们为“无冕之王”。后来西方新闻界一些人就以“无冕之王”来自诩记者社会地位崇高,享有凌驾于一般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和权利。“无冕之王”的说法散发出一种浓重的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气息,是对新闻工作者社会角色的一种不正确的定位。这种思想在中国部分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中间也颇有市场,其实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解放日报》在对“无冕之王”思想进行批判时,首先戳破这种观念的虚幻性:“其实,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无冕之王’,却毫无尊严可言,当剥削者认为他还有用的时候,就雇佣他,一旦用不着他了,就挥之使去,这就迫得‘无冕之王’不得不替剥削者服务。‘无冕之王’好像是很自由的,其实,他的自由绝对不能超出他的雇佣者所容许的范围,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7]陆定一则着力揭露“无冕之王”的思想鼓吹者具有一种险恶用心,是企图对新闻工作者灌输一种反动的思想,使他们自认为是与众不同的人,叫他们与人民远远的分裂开来。他们一方面吹捧新闻记者为

“无冕之王”，为“先知先觉”，另一方面，则对新闻工作者施以法西斯的残酷压迫，不给新闻工作者以与人民接触的机会，不给他们以替人民说话的权利，而且用手枪和活埋，强迫新闻工作者出卖灵魂，“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使新闻工作者形成一种‘报阀’，甚至成为一群丧尽天良的特务，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而还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这样好甘心情愿给反动派新专制主义者当作反革命的工具使用。”^{[6]195}新闻工作者必须打消“无冕之王”的虚幻意识，牢固树立公仆和服务意识。“我们是党和人民这个大集体的公仆。我们不是依照个人兴趣和为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办事，我们老老实实为党和人民办事。”党的新闻工作者与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后者为少数人服务，前者为党和人民工作，为一个大的集体工作。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切实认识到“群众的力量是最伟大的，这对于办报毫无例外”。^{[6]196}新闻工作者应加强思想修养，把自己融化到集体之中，个人利益和兴趣服从集体的利益，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媒介批评中还对“同人办报”理念进行了批判。所谓“同人办报”，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自愿结合起来办报，一般不受政府和政党的控制，标榜言论自由。报馆同人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传播内容，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评论，而不顾及党派原则。“同人办报”是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传统在新闻实践领域的体现。他们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企图以文章报国，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们受到儒家“君子群而不党”思想的熏染，无党无派，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对政治采取崖岸自高的态度，论政而不参政。“同人办报”的精神实质是个人自由主义，这不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需要方枘圆凿，而且与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党报思想格格不入。中国共产党从组织和教育的角度认识报纸的功能，并据此规定了党的新闻工作者与党报的关系：“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都是党和人民所聘请的教师。所以在我们的报纸做工作，跟在资产阶级报纸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是最严肃最负责任的工作者。党必须集中最有才能最有信仰的宣传力量在自己的报纸上，并且使它发表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它存在的理由。”^[8]党报，顾名思义是全党的报纸，不是几个办报人的报纸。《解放日报》在社论《党与党报》中阐释党报与同人报纸的区别道：“如果说这个‘集体’就是指报馆同人而言，指几个在报

馆里工作的人员而言，那末，报纸就不成其为党报，而成为报馆几个工作人员的报纸。”^[9]如果这样就会不顾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依照个人意见、个人兴趣办事。“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9]该报创刊一千期时，再次发文告诫有关同志：“我们要努力来进一步提高报纸的质。要办到这件事，一定要全党来努力，万万不可以只有少数人努力，万万不可以回到改版以前那种‘记者办报’的情况中去。”^[10]在党报工作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是党的一分子，在党报上写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选的消息和标的标题，都要对全党负责。

三

在波谲云诡、尖锐复杂的政治领域，基于传播媒介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影响，任何时候报刊都是对敌斗争的有力工具。掌握了大众传媒，在一定意义上就掌握了思想和事实传播的权力，掌握了一种有效影响媒介受众的途径，这正是政治力量要对大众传媒加以控制的根本原因。抗战开始不久，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留守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指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11]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党的新闻媒体在宣传工作方面不时发生违背党的方针、路线和要求的行为。因此，从政治路线和党的政策执行角度对媒体的传播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和评判，就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经常性主题和重要内容。

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中，批评各根据地的广播和战报中存在许多宣传违反党的政策的言论，对外宣传不统一、不慎重。中央在指示中郑重指出：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

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2]98} 要求新闻宣传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保持高度一致。1942年4月1日,中央书记处同日发出两个指示。在关于加强对晋东南通讯社广播的控制问题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中,批评“晋东南新华社关于电请阎锡山移驻我区及袁晓轩问题的广播,我们认为不妥当,因前一个电报使阎锡山难堪,后一电报则会挑起国民党宣布袁系自首。请今后加强对晋东南通讯社的控制,执行中央去年电令,除各根据地地方战况及地方情况报导外,凡带有关系全党全八路军性质的文件电文必须事先征求中央同意,否则一律不准任意广播。”^{[2]119} 在关于统一对外宣传的第二次指示电中,再次对这一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去年中央曾电令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带有全国、全党、全八路军、全新四军性质的文件、电文、讲演、必须事先征得中央同意,否则一律不准任意发表与广播。近来仍有个别地方未遵照此电令,有碍政治步调的齐一,望各地负责同志对通讯社及报纸严加约束。”^{[2]120} 可见中央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1942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发出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批评“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五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2]121} 认为这是由于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所造成的。批评一些领导同志“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2]121} 指示中要求各地领导立即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使各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2]121} 要他们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文件去教育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虽然出版环境比较特殊,但作为党的机关报,仍然需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该报在如何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上,有过疏失。1943年中宣部曾就《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工作问题,专门给董必武发出电报,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提出三点批评:一是该报在有些材料的处理上政治立场模糊:“七、八、九月,党对反共高潮严厉反击,而《新华》却大捧林森、宋子文、苏州反省院长,一县一机与所谓两年实行宪政,这是失掉立场的。即在平日,对蒋介石、国民党亦不应人云亦云,经常头条大题,使国共在群众中无所区别。”^{[2]137} 提醒他们提高政治警觉性,“对反革命私货,尤须提高警惕,如捧反省院文章,即须研究来源责任,使编辑部养成清醒严肃态度。”^{[2]137} 二是批评他们在策略上还缺少灵活性,指出在大后方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反动派,要力避被对方利用。为此在政治上应着重宣传德日及附庸国家法西斯的反动,苏联与欧美人民及进步人士反法西斯的斗争与言论。除塔斯社稿外,还可自编新闻,对路透社、合众社的稿件则须有选择。要大力宣传边区、华北、华中的战争与生产,宣传孙中山的进步方面。电报认为《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对这些可能的办法重视不够,提出要在思想上应宣传唯物论、唯物史观,与为群众服务的人生观,建议他们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改造学习、整顿三风、文艺座谈会讲话等文件精神,联系世界、中国的现实与青年立身处世问题,写成有系统的亲切通俗通得过审查的文章和小册子,来战胜蒋介石、陈立夫、冯友兰、朱光潜、加内基、马尔腾辈的乌烟瘴气。电报中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民族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大后方很多人正利用民族口号鼓吹儒家与其他复古独裁思想,故党的报刊与作家对此更须慎重,不可牵强附和。”^{[2]138} 三是批评《新华日报》缺少群众性。“我们的报纸必须是群众性的,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原则区别,现在《新华》统治阶级新闻与知识分子议论太多,应有一个大转变,多登反映群众生活各种侧面的东西,多登能适应群众各种日常需要的东西,多登群众自己写的各种东西(但要力避与他们通信),这些材料应力求通得过审查,并尽可能逐渐增加其分量,使人民觉得这究竟是自己的报纸。联共党史第五章真理报经验遂不能硬搬,但应学习如此。”^{[2]138} 这些批评高屋建瓴,具有极高的政治高度,批评问题犀利严肃,语气又委婉温和。

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12]的名言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普遍接受,当时延安和各根据地报刊上关于党报的文章与中共关于党报的决议中,都屡次引用列宁的这个著名观点。如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即以列宁和斯大林的话为开始,又以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为结尾:“什么是党报?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必然会想起‘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列宁)‘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斯大林)这一类名言。”^[13]在涡北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地《拂晓报》办公室里的墙壁上,当时就书写着这样两句名言:“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5]^[32]由此可见列宁这一党报思想在根据地新闻界的流行和普及程度,它也就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重要论据和出发点。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中,一方面肯定和赞扬该报“对于党的工作,更加起了推动和组织的作用(如最近的生产运动),这是半年来我们在党报工作方面的收获。”^[2]^[14]另一方面批评该报“还存在着不少弱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各地情况的报道,还嫌不够具体和深刻,多未能做到对于一项工作坚持的有系统的报道,往往是有头无尾的。如对于各种政策的执行,各种运动和工作的

进程,开始如何计划和布置,进行中有些什么困难,怎样克服困难,有些什么典型例子,犯过一些什么错误,有些什么可取的经验,足供大家借镜等等,都还反映得不够。”^[2]^[142]彭雪枫《〈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方针》文中,批评该报“在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发扬群众的创造性、推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动而主要是‘组织’他们的热情,‘适时的’提出‘号召’,发起‘竞赛’,完成某一时期某一工作的‘运动’,还作得极端不够。”^[14]批评理路也明显是以列宁关于报刊功能的论断作为理论基点。

四

媒介批评是以否定的形式实现对某一种传播形态的肯定性建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活动丰富多彩,作为对新闻实践的一种反思性精神活动,它对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敷陈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在具体的媒介批评过程中,或者借助于媒介批评活动,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完成了党的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并确立了其对新闻实践的权威指导地位。当然,由于抗战全民动员宣传的强烈需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有着扩张理解新闻功能,致使媒介批评边界模糊的倾向,但这是时代的局限。细密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无疑将具有很高的新闻史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英)苏珊·L·卡拉瑟斯.西方传媒与战争[M].张毓强,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G].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3]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449.
- [4] 中宣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J].解放日报,1942-4-1.
- [5] 杨居人.拂晓报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G].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 [7] 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J].解放日报,1942-11-17.
- [8] 胡乔木.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J].解放日报,1943-1-26.
- [9] 《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J].解放日报,1942-9-22.
- [10] 本报创刊一千期[J].解放日报,1944-2-16.
- [11] 中典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G].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39.
- [12] 陈力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新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224.
- [13] 《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J].解放日报,1942-4-1.
- [14] 彭雪枫.《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及其今后方针[J].拂晓报,1939-10-5.

(责任编辑:闫卫平)